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

1953-2003

文学研究所 学术文选

WENXUE YAN
JIUSUO XUESHU
WENXUAN

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

1953-2003

文学研究所 学术文选

WENXUE YAN
JIUSUO XUESHU
WENXUAN

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研究所学术文选: 1953~2003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8

ISBN 7-5004-3877-X

I. 文… II. 中… III. 文学研究-世界-文集 IV. 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4850 号

责任校对 李小冰

封面设计 毛国宣

版式设计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桃园兴华装订厂

版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3.25 插 页 2

字 数 3000 千字

定 价 280.00 元 (全五卷)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委会名单

主 编 杨 义

编委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信	王善忠	邓绍基	刘扬忠
朱 寨	何文轩	杜书瀛	杨 义
杨匡汉	张 炯	赵 园	钱中文
徐公持	党圣元	钱 竞	樊 骏

秘书长 严 平

目 录

序言

——解读文学所 杨 义 (1)

1954 年

关汉卿行年考 孙楷第 (35)

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

——《呐喊》与《彷徨》研究之一 陈 涌 (40)

1955 年

论魏晋时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及其社会

根源 范 宁 (80)

1956 年

《诗经选》前言 余冠英 (104)

贾宝玉论 蒋和森 (128)

白居易作品中的思想矛盾 陈友琴 (173)

1957 年

论《红楼梦》(节要) 何其芳 (209)

《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问题 王佩璋 (245)

- 《史记选》序例 王伯祥 (254)
 《宋诗选注》序 钱锺书 (269)

1958 年

- 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 郑振铎 (291)
 论郭沫若的历史剧 王淑明 (304)

1959 年

真实和虚构

——关于特写、传记、回忆录等一个基本

- 问题的讨论 井岩盾 (326)

1961 年

- 论鲁迅的美学思想 唐 弢 (346)

1962 年

民间故事的魅力

- 《中国民间故事选》二集序言 贾 芝 (377)

1963 年

- 《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 俞平伯 (397)

1964 年

- 论《伤逝》 于维洛 (451)
 论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 力 扬 (478)

1965 年

- 试论阿古登巴的故事 祁连休 (511)

1973 年**《草堂诗余》跋**

——兼论宋人词集与语本之关系 吴世昌 (530)

1978 年

评苏轼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诗 王水照 (539)

1979 年**论《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

——纪念老舍先生 80 诞辰 樊 骏 (557)

写“中间人物”主张的再评价 王 信 (581)

电影文学断想 钟惦棐 (597)

柔石论 王保生 (629)

1989/01

序 言

——解读文学所

杨 义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已经成立 50 周年了。走过辉煌而曲折的 50 年历程的文学所是一本大书，有自己的章节，自己的关键词，自己的省略号和感叹号。它引人瞩目的历史，是新中国文学学术半个世纪发展进程的一个极好的缩影。解读它丰盛的成果、雄厚的阵容和曲折的历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解读中国学术的姿态和模样，性格和命运。

1953 年 2 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决定成立这个文学研究所，任命郑振铎为所长，何其芳为副所长。在共和国经济基本恢复而重新规划建设蓝图的关键时刻，就成立这么一个国家级的文学研究中心。其宗旨在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地建设与共和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相适应文学学术体系。自其领军人物和基本骨干配置而言，一种想开拓和振兴具有大国风范的博大精深的文学学术的雄心，呼之欲出。

学术建设的宗旨，首先要落实到人才和阵容，以及人才阵容的组合运作机制。对于一个新成立的研究所，所长、副所长的配

置，实际上是配置一面旗帜。它是一种标志，由此可以衍生出一种所风，一种传统。以望重、资深、学博的“五四”文学健将和著名的文物、文献、文学史专家郑振铎为所长，又以才情颖秀、思维深湛的著名诗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何其芳为副所长，这就把文学所的发展置于一个良性互动的非常高的起点上。郑振铎是“五四”时期重要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核心人物，主持过新文学中几种最重要的大型核心期刊，曾在京、沪等地的高等学府执教，著述了《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等几种具有深厚而独到的文献学根柢的文学史著作，又是著名的藏书家。他以长者风范交游文坛学界，培植后进，真可谓朋友门生遍天下。学界名家如钱锺书、季羨林、吴晗、余冠英、林庚、吴世昌、李长之、吴晓铃，多得到过他的帮助。在30年代的文学青年中，便有“对新进作家爱护的有南迅北铎”，即把郑振铎与鲁迅并称的口碑。^[1]以这样一位在文学界、学术界举足轻重的长者来领衔建所，对于延揽人才，拓展学术研究的空间，直到建构研究所的堂庑规制，都具有众望所归的价值。在不长的时间汇聚于文学所的俞平伯、钱锺书、余冠英、王伯祥、孙楷第、蔡仪、唐弢、吴晓铃、卞之琳、潘家洵、罗念生、杨绛(季康)、戈宝权、罗大冈、李健吾、毛星、贾芝、陈翔鹤、范宁、张白山、叶水夫等学者，都是一时人才之选，这与郑振铎的旗帜作用和号召力都有直接或间接关系。

从一开始就主持文学所常务工作，而后又继任所长的何其芳，也是建所工程的一着关键的棋子。他学养精湛，又身为延安革命文艺理论的代表性人物，在把握文学研究方向的时候，在当时堪称难能可贵地为文学所保留着相当程度的系统研究和自由争论的空间。他认真、谦和、平易近人，有学术长远发展的眼光，尊重老知识分子的人格和专长。一个很值得深思的例子是，在1954年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被当成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学术思想的典型，进行声势浩大的批判的潮流中，他在文学所的研

究工作还被安排去参汇《石头记》几种早期脂评本，校勘成《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出版。其后又编著《唐宋词选释》，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梓行。何其芳不是随风煽火的人，而是保持着敢于承担压力的历史理性精神，不仅把受到过全国性批判的俞平伯定为一級研究员，而且从一种历史可能性的角度，尽可能发挥俞平伯的学养特长，使他在“逆境”中得其“顺”，在《红楼梦》版本学和古典诗词鉴赏学上依然作出别人难以替代的开拓性工作。

何其芳为文学所留下一个传统，就是慧眼识才，精心育才，在热情选择和培养青年科研人才中付出极大的心血，用以充实文学所梯队式持续发展的内在元气和可以期待的潜力。他网罗全国著名高校的优秀毕业生，与之进行入所谈话，为之选定科研领域，修改文章，指点治学门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实在是他所长生涯的一大乐趣。由此汇聚而成为名家的文学所第二代学者，有曹道衡、胡念贻、樊骏、蒋和森、邓绍基、王水照、钱中文、陈毓罍、刘世德、林非、张炯、吴元迈、朱虹、柳鸣九、董衡巽、陈槃等等，可谓人才济济，学风强劲。何其芳亲自为新入所的青年学人拟定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和中外古今名著100种书目，后来又增至三百余种，强调基本训练，提倡知识上既广又深，促进一代优秀学人打下坚实的根柢和丰沛的后劲。50年代末60年代初，文学所与中国人民大学合办文学研究班，何其芳任班主任，遍请全国学科领域最有名的专家给研究生授课，并把研究生中一些优秀人才王春元、何西来、张锡厚、王俊年、杨世伟调入文学所。在1962年以后，又招收了郑克鲁、张英伦、金子信、杜书瀛、吕薇芬等研究生。人才是治所之本，本固则果硕，这是何其芳治所方略的关键所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文学研究所立即组建研究生院文学系，以王士菁为系主任，首批以余冠英、吴世昌、唐弢、蔡仪为导师，发挥名师效应向全国招生。首批硕士留所的有董乃斌、石昌渝、刘扬忠、杨义、刘纳、

钱竞、许明、周发祥、王飏、胡明、陶文鹏等 20 人，其后又有汪晖、陈晓明、刘跃进、黎湘萍、张中良等博士以及党圣元等硕士留所，加上从各高校优秀研究生、大学生和学成归国者中调入的赵园、曾镇南、程蔷、蒋寅、孟繁华、吕微、孙歌、李洁非、高建平等人，大体上组成了文学所跨世纪的一代学术骨干。广东的一家信息公司对全国研究生教学进行评估，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排在相同学科的首列。这种以人才立所的方针，是与何其芳的治所传统前后相承的，它为文学所近 20 余年大量优秀学术著作的出现，提供了人才保障。

二

大国的学术建设，在人才荟萃之际，还须有良好的学风和宽阔的学术创造的空间。文学所早期的所风，被明确表述为“谦虚的、刻苦的、实事求是的”，这体现了戒空疏、戒浮躁、戒狂妄的脚踏实地的文学学术建设者的姿态。即便在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愈来愈紧的岁月，它还竭力为自身的学术形态和学术风格营造自由辩论的氛围。当所内外对文学所的任务形成“系统派”和“当前派”两种意见时，何其芳则主张系统的研究和当前的文学批评并重，在当时环境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为学养和风格各异的学者群提供各尽所能的多样性的学术研究空间。然而历史是严峻而曲折的，是不以个人的良好愿望改变的。文学所的建设起步不久，即面临着日益“左”倾的政治环境对正常的学术工作、学术秩序的冲击，学术思想和学术个性受到强行扭曲和压抑，一批学术人才被淹没（老专家）和被浪费（青年研究人员），教训是痛切的。有学术空间，就有学术个性发展的可能；学术空间的缩减，只能造成学术个性的扭曲和萎缩，这种历史教训对于我们去创造一种大国学术来说，是不可不记取的。苦心营造的学术空间

的艰难存在，加上早期研究者渊博坚实的学养素质，使文学所顽强地形成了一种文史贯通、史论兼长、中外合观的学术气象。它以一系列富有眼光、又行之有效的措施，推出一批学术名牌，在全国学界享有崇高的声誉。

首先是系列丛书和珍本古籍集成的编纂。这是发挥文学所学科齐全、名家荟萃的条件，在基础性学术建设上形成规模效应的做法。郑振铎的才能类型是文史兼通，于古籍版本和俗文学研究上尤为独步。以他为主编，并集中吴晓铃等专家，于1954年起，影印出版《古本戏曲丛刊》，为戏曲研究界提供了一批极其难得的古代戏曲之珍本和孤本。在更大范围内调动学者的实力来做文明传播工作的，是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校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丛书》，1956年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又名“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同时还翻译出版了三大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数十种，以及《外国文艺理论译丛》（后分为《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现代文艺理论译丛》）。余冠英在古籍整理方面用力最勤，在清华执教时就编有《乐府诗选》，入文学所后又编成《诗经选》、《三曹诗选》、《汉魏六朝诗选》，以及在何其芳直接参与下集体编成《唐诗选》。他整理古籍的风格是为学深湛而为文谨严通达，言必有据，实实在在，雅洁简明，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学风。

在这套“读本丛书”中，借选本形式透出选家博通的学养和真灼的眼光的，是钱锺书的《宋诗选注》。它由郑振铎提议选家，由钱锺书用两年工夫进行了对宋代别集无所不窥的清理，又以洞幽察微的眼光遴选而成，选注81位诗人的作品297题。它极其强调诗的审美特质，在诗人小传和注解中抓住细微的语言沿革和意象变异，直逼诗人创新或摹仿的招数，深沉地呼唤着审美的创新精神。选家好用种种妙喻，在把握诗人个性和诗史脉络中带有几分俏皮，往往令古人尴尬，读者开心。这个选本的风格，既跨

越前人，又独立于时代潮流，一经问世，便引起从极端政治文化角度对它的“形式主义”和“艺术至上主义”的指责。但海内外知音者不少，认为它是“一种创造”，“一个有机体”，“最引人入胜的就是这些议论意趣洋溢的小序了”。^[2]甚至说，“由于这本书的出现，大概宋代文学史很多部分必须改写了”。^[3]

文学研究所推出学术名牌的另一个重要举措，是在20世纪50年代先后创办了《文学遗产》、《文学评论》这两个全国性学术刊物，对全国的文学研究的质量和学术方式起了引导和建设作用。《文学遗产》创刊于1954年，原采取《光明日报》副刊的形式，1980年以后改为季刊、双月刊。《文学评论》原名《文学研究》，1957年创刊时为季刊，1959年改为双月刊后使用今名。它们的创刊宗旨和办刊方针，在当时过度政治化的极“左”思潮中可谓独树一帜。《文学遗产》秉承的办刊宗旨，既强调“运用科学的观点与方法”正确评价传统文学，又主张对一些重要问题“展开活泼的自由论辩”。《文学遗产》曾经就如何批判继承的问题、“中间作品”评价问题，文学史编写原则问题，以及一系列有美学魅力的古代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展开讨论，结集出版了《陶渊明讨论集》、《李煜词讨论集》和《胡笳十八拍讨论集》。《文学评论》的办刊方针，则主张中外古今、百家争鸣、保证质量。创刊号的“编后记”中着重说明：“许多文学历史和文学理论上的重大问题，都不是依靠短促的无准备的谈论就能很好地解决的，需要有一些人进行持久而辛勤的研究，并展开更为认真而时间也较长的讨论。我们这个刊物打算尽可能废除一些不利于学术发展的清规戒律。我们将努力遵循党所提出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尽可能使多种多样的研究文章，多种多样的学术意见，都能够在这上面发表。”这在当时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吹来一股开明、开放、求实、宽容的清新空气，足可成为专业研究者回归专业的园地。《文学评论》组成了一个由全国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

研究界最著名的学者参加的编委会,除了文学所的郑振铎、何其芳、俞平伯、毛星、钱锺书、李健吾、卞之琳等一批学者之外,还汇集了全国各著名高校的权威性学者,如刘大杰、刘文典、陆侃如、季羨林、夏承焘、郭绍虞、冯至、冯雪峰、程千帆、游国恩、钟敬文等等。刊物的最初几期的稿子多是编委们经年悉心研究的成果,不仅展示了深厚的学养,而且标志着一种严肃认真的学术风范和学术规范,为全国文学学术界竖起了一面权威性的旗帜。《文学评论》对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现实主义问题、诗歌形式问题、文学上的共鸣与山水诗问题,历史剧问题等等,也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这两个刊物善于把握学术前沿,多用名家名文,又热情扶植后学新秀,可以说,中国文学研究界的著名学者几乎没有不在这两个刊物上发表过有分量的论文的,同时,中国文学研究界的后起之秀,也多在这两个刊物上发表他们的成名之作。在这两个刊物上发表论文,成为衡量文学专业人才的学术档次的一个标准,已经历久不衰地获得学界的共识。

再一个推出学术名牌的重要举措,是集中文学所各学科的重要学者(有时也借助所外的一些力量)编写一批奠定学科格局和规模的重要著作,推出“大部头”,包括1960年以后何其芳直接参与的《中国文学史》三卷,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和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环境中,这些著作都强调文献学的确定性和作家作品分析的辩证法思维方式。比如何其芳为《中国文学史》的编写,提出三点基本要求:(1)材料翔实;(2)论点妥当;(3)文字精炼,且有一定的见解。他特地请人翻译了《英国文学史》、《法国文学史》、《苏联文学史》的目录,以及泰纳的《英国文学史·序言》作为参考,拓展了编写者开放性的世界视野。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主张“论从史出”,他制订的编写原则,首先要求“必须采用第一手材料。作品要查最初发表的期刊,至少也应依据初版或者早

期的印本，以免转辗因袭，以讹传讹”。其次要“注意写出时代气氛。文学史写的历史衍变的脉络，只有掌握时代的横的面貌，才能写出历史的纵的发展。报刊所载同一问题的其他文章，自应充分利用”。^[4]这种实事求是，刨根究柢的文学史编写原则，使他们主编的史著显示了当时难能可贵的充实和丰满，代表了文学史编写的一个历史阶段的最高水准。

三

应该看到，由于文学研究所的特殊位置，它所承担的国家学术的责任，它因而有时要依靠自身雄厚的学术力量，去完成党和政府交办的任务。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关心下，1961年文学所编选出版了《不怕鬼的故事》。这对于困难时期抗击国际反华势力，振奋全民族不怕鬼、不信邪的精神，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使《说不怕鬼》的作文题目进入当年的全国高考试场。1999年文学所为了批判“法轮功”邪教，扩充改编了《不怕鬼的故事》和新编了《不信神的故事》，便是这一传统的延续。其后，它又为反击李登辉的“台独”言行，编选《台湾爱国文鉴》、《台湾爱国诗鉴》，还编纂了全国干部学习读本《古今文学名篇》上下册，都是发挥自身丰厚的学术积累，积极参与国家统一和民族精神建设的行为。

然而，这么一种身分和位置，当整个社会文化思潮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历次政治运动中趋于“左”倾的时候，使文学所的领导者不可能置身度外，姿态超然。何其芳1952—1958年“参加文艺界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写了一些长篇文章，结集为《没有斗争就不能前进》。由于他理论思辨能力强，文章有分量，有的文章就被人视为似乎给某场“斗争”做结论，留下了不应讳言的时代缺陷。但是我们有必要分清，这是整个社会的“公共话题”还是文学研究领域

的“专业话题”。在专业话题上，何其芳往往能够根据历史提供的可能性，以不同的方式抵制“左”的思潮。其煞费苦心之处，甚至提出一些属于他个人的“话语”，通过“话语”来引导讨论的注意力和化解政治压力。比如在1959年夏的文学史问题讨论会上，他针对几家高校的学生以“大跃进”的速度写成的三部文学史的倾向，明确表示不能把丰富复杂的文学史简单化为“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认为“只有民间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主流，这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是说不通的”，“无论如何不能忽视文学史上的长期的大量的文人文学的存在”。他提出“带中间性的作品”的话语，肯定了王维、李贺、李商隐、杜牧、李煜、李清照、姜夔、马致远等作家的艺术特色，反对简单化地把他们归入“反现实主义”而贬抑，他主张：“与其要有一个不合乎事实的不正确的公式，我觉得还不如暂时不要公式。”^[5]这种敢于实事求是而力挽狂澜的理论勇气，是值得钦佩的。

考察一个学者的学术流品，应该严格把他置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看他与当时的潮流有什么同异，看哪些东西是他身不由己的奉命所为，哪些东西是他出诸内在欲望的刻意追求，要从复杂纷纭的现象中把握他的精神本质所在。何其芳到文学所上任之后，就开始对《诗经》、《楚辞》以降的中国文学史进行系统研究，而用力最深的是用了一年时间，于1956年秋冬之际写成的名文《论〈红楼梦〉》。他既认真地清理了清初的文化思潮和《红楼梦》传世后的相关文献，做到全局在胸，又以出色的感受能力细读文本，中外古今出入从容，条分缕析托出创见。最精彩的是对宝、黛、钗以及王熙凤、晴雯、刘姥姥的典型形象分析，感受精微，绵密周至，散发着理论分析的强大的说服力和诗情魅力。尤其是他力摒《红楼梦》研究中十分流行的、也是马林科夫在苏共十九大报告提出而普遍流行于文学研究界的“典型被归结为一定社会历史现象的本质，说典型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政治性问题，这样一些片面的简单化的公式”，以宝、黛为例，提出“典

型共名说”，更是当时引起不小波澜的“何其芳话语”。^[6]其实，这是何其芳 50 年代阅读经典作品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理论情结”，还在 1954 年谈《儒林外史》时，就以马二先生的形象涉及“共名”；在写作《论〈红楼梦〉》前后，又应邀为纪念鲁迅而写《论阿 Q》，专门在“典型共名说”上展开阐释。这种超越“典型的共性就是阶级性”的流行观念而直逼文学本质的行为，在当时历史情境中的意义已经超出了具体见解本身，唤醒了文学研究的探索性活力。

探索的活力，在蒋和森 1959 年出版的《红楼梦论稿》中也体现得相当充分。他认为：“在那块通灵的‘石头’上，不仅铭记祖国的历史生活风貌，而且还向千秋万代人们的心里传送着诗情和智慧的火炬。”^[7]1956 年未及“而立”之年的蒋和森写出《贾宝玉论》，受到何其芳复函称许，发表在《人民文学》上。此后他以一系列文采飞扬的红楼人物论，对这部古典杰作进行诗情的采炼，使众多的读者为之动情。至此文学研究所开始隐隐然出现一个潜在的《红楼梦》学派，以何其芳领头，有俞平伯增加分量，又有邓绍基、刘世德、陈毓黑、王佩璋、蒋和森为后劲，其风格是一重版本，二重诗情，显得厚重而灵动。1979 年，由邓绍基任主编，陈毓黑、刘世德任副主编的《红楼梦研究集刊》创刊，共出 14 辑，以其扎实持重的风格引人注目。

四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解释、评论文学的历史和现状，是文学所建所伊始就确立的基本原则。在守持文学的研究方向上，一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家发挥了特殊重要的作用。只不过文学所的这批学者以此阐释文学的政治价值和社会功能之时，比较强调和注意把握文学艺术的特殊规律，以各种方式